

# 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

张 娆 徐 容\*

**摘要:**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作为中国城市治理新模式,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以 2009—2022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初步研究发现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增加政府环保补助两条路径提升企业 ESG 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控股、内部控制健全、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更显著。细分 ESG 分项指标的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于企业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公司治理(G)三个维度的表现均有显著改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表现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继续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政策,针对企业和行业的不同属性完善政策体系,为企业 ESG 实践提供资源支持;同时,企业要增强对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敏感性,抓住政策机遇,实现企业 ESG 战略转型。

**关键词:**文明城市;企业 ESG 表现;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

## 一、引言

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极具价值的城市品牌,是评价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也是含金量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国家级城市评比项目。这意味着文明城市创建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的政策(逯进等,2020),必然会对当地企业行为产生深远影响。2003年,中央文明委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文明城市评选活动。2004年9月,中央文明委发布了《全国文明

---

\*张娆(通讯作者),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zr@njau.edu.cn;徐容,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2967108878@qq.com。

本文系江苏高校“青蓝工程”(2022-2025)、江苏省高校社科联发展专项“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智库优化策略与模式选择”(22GSB-008)、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学科建设专项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项目“国家绿色政策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政策解构、理论推演与实证研究”(ZDXM2022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城市测评体系(试行)》,对城市生态和环境污染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管控要求(逯进等,2020)。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其ESG表现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企业ESG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率(王禹等,2022)。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指标涵盖了环境、卫生、文化等非经济领域,整合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方成、王悦,2023),这在微观层面上与企业ESG表现相呼应。可见,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可能对企业进行ESG实践、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城市的文明程度也与当地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文明城市”荣誉称号会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当地企业(王雅莉等,2022),助力当地企业构建ESG实践体系。因此,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对切实发挥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效果,构建绿色政策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国文明城市平均每三年评选一次,且执行动态复审机制,每年都会对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进行测评,根据评选周期内的测评结果决定是否保留“文明城市”头衔。地方政府为了保留“文明城市”的荣誉称号,往往会加大治理力度(谌仁俊等,2021),增强城市文明薄弱环节建设。而企业作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其经营管理活动深受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影响。具体而言,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实施所带来的环境合法性压力将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对地方政府官员产生的晋升激励也会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增加企业所获取的物质帮扶,鼓励企业积极从事ESG实践,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现有对文明城市创建的研究主要从企业环保实践、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子维度探究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关于其对企业综合ESG行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企业ESG表现作为衡量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的综合指标,成为了彰显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王浩宇,2023;陈琪、李梦函,2023)。因此,本文关注以下问题,文明城市创建是否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是否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产生差异?探究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加切实地理解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而且能够为助力“双碳”战略目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探索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现有文献多检验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直接效应,鲜有研究深入挖掘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和政府环保补助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解读了文明城市创建提升企业ESG表现的深层逻辑。第二,探究在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和行业竞争程度差异下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政府准确把握文明城市创建政策的实施方向、措施和力度,也帮助企业结合自身条件响应文明城市创建政策、优化ESG行为。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 (一)文献综述

文明城市创建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跨区域投资、污染治理、人口流动、能源效率、税收征管等方面分析文明城市创建所带来的后果。在企业跨区域投资方面,刘佳伟等(2024)基于上市公司新增加的子公司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能够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进而吸引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在污染治理方面,逯进等(2020)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评选能够通过引导技术创新和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来降低当地环境污染。吴敏和黄玖立(2022)认为城市入选文明城市名单会促进城市垃圾处理进而提升生活垃圾清运量和无害化处理能力。Zhang 和 Hong(2023)研究发现,文明城市表彰通过增加企业创新投入和吸引创新人才集聚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在人口流动方面,牛耕等(2022)研究发现文明城市所带来的城市品牌效应会提升城市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陈家和等(2022)认为“全国文明城市”能够产生信号传递作用,进而影响流动人口选址决策。在能源效率方面,Li 等(2022)研究发现,文明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在税收征管方面,詹新宇和王一欢(2022)发现文明城市创建通过规模效应和激励效应两个方面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

企业的 ESG 表现是衡量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综合指标,也是反映企业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王浩宇,2023)。目前学者主要从公司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探究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因素。在内部因素方面,Cucari 等(2018)对意大利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独立董事和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能够促进企业 ESG 披露。柳学信等(2022)认为企业党组织治理能够保障企业 ESG 决策的有力执行,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 ESG 责任。Barko 等(2022)基于国际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社会责任敏感型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能够促进企业提升 ESG 表现。DasGupta 等(2022)研究发现,财务绩效不足会促使企业提升 ESG 绩效,以维持组织合法性。Garcia 等(2017)以金砖国家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具有行业敏感性的公司往往更有动机提升其 ESG 表现。在外部因素方面,翟胜宝等(2022)认为媒体关注可以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引起外部监督,从而提升企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王禹等(2022)利用环保税法出台这一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发现税制绿色化能够促进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Ren 等(2023)认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ESG 绩效,尤其是环境绩效,且数字金融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外部监管效率两条路径提升企业 ESG 绩效。

作为全国城市综合类评选的最高荣誉(Li & Wen, 2023),“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所带来的“标杆效应”会促使当地企业改善其 ESG 行为。有学者研究了文明城市对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三个维度表现的影响。在环境保护(E)方面,谌仁俊等(2021)认为文明城市

评选活动能够对地方官员产生政治激励效应,引导具有政治强激励的官员推动地方企业减排。Zhang等(2021)研究发现,位于“文明城市”的企业环境绩效要高于其他企业。蔡海静等(2023)认为文明城市评选的环境规制属性能够督促企业降低环境负外部性,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文明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方面。然而,刘建秋和徐雨露(2023)则认为文明城市建设活动能够促进当地企业绿色创新“提质增效”。Li和Wen(2023)认为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能够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促使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进而提升碳效率。在社会责任(S)层面,徐换歌和陈波(2022)认为文明城市称号所带来的声誉效应能够激发企业自身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促使企业提升社会责任。而王雅莉等(2022)则分别从城市、企业和个人层面进行研究发现,文明城市创建能够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促进高素质人才流入和改良当地社会信用环境三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在公司治理(G)方面,刘建秋等(2023)研究发现为了迎合地方政府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当地企业会主动进行内源修正,规范自身经营活动,积极披露企业相关信息。同时,文明城市创建也会优化企业所处的外部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外部治理水平。

上述文献表明,现有学者已经针对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展开了诸多有益探索。但目前关于文明城市创建对当地企业ESG综合表现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鲜有文献关注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绩效的作用机制。因此,本文将深入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综合表现的影响,以打开文明城市创建推进企业提升ESG表现的“黑箱”。

## (二)研究假说

### 1. 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ESG表现

“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央文明委对整体文明水平较高的城市所授予的荣誉称号,目的在于表彰积极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且具有示范作用的城市(姚鹏等,2021;陈家和等,2022)。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

首先,在环境保护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会提升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促进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水平。在中央文明委的指导下,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包含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和谐宜居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八大环境。其中,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对城市的生态情况和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严格要求。为了满足文明城市的要求,政府会制定系列政策改善城市环境污染,提升当地生态文明水平(石大千等,2019)。而企业作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对象,政府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会加强对其环境治理力度(逯进等,2020)。政府针对企业污染制定的系列奖惩措施会迫使企业增加对环境的关注度,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参与环境保护,履行企业环境责任(王雅莉等,

2022)。因此,文明城市创建会加强企业环境维度的表现。

其次,在社会责任方面,文明城市创建会促使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文明城市创建致力于建立更加和谐美丽的社会(詹新宇、王一欢,2022),提升当地整体文明水平。在文明的社会氛围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得到增强(Li & Wen,2023)。根据组织合法性理论,当企业的行为决策与社会价值观念相一致时,才能获得政府、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使得组织行为合法化(柳学信等,2022)。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会增强企业的道德感,促使企业有动力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公众等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王雅莉等,2022),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获取更多社会资源(Li et al.,2019)。此外,环境保护责任本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特殊地位,被 ESG 相关政策单列出来放在首位(王禹等,2022)。文明城市在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同时,也会激励企业积极承担其他社会责任(王禹等,2022),如产品责任、税收遵从、慈善捐赠、健康安全等。因此,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提升当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最后,在公司治理方面,文明城市创建对公司治理水平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全国文明城市”是全国综合类城市评比中含金量最高、创建难度最大的城市品牌,是城市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牛耕等,2022)。根据信号传递理论,“全国文明城市”品牌的塑造能够缓解具有迁移意向的人口与城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向流动人口传递具有权威性的城市治理能力的信号,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城市(朱金鹤等,2021;陈家和等,2022)。同时,文明城市品牌也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向当地企业聚集(王雅莉等,2022),增强高教育水平人员留居当地的意愿(牛耕等,2022)。而企业高管的决策过程与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相关,高管的教育经历会对其管理理念和决策制定产生影响(王雅莉等,2022)。高管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处理复杂问题能力越强,个体责任意识 and 环境敏感度更高,对企业 ESG 表现的关注更多,更有能力完善企业 ESG 治理体系,识别具有战略意义的 ESG 议题,强化 ESG 信息披露。因此,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提升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文明城市创建会促进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

## 2. 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机制

“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作为我国政府设置的一项非经济领域晋升锦标赛(Zhang & Hong, 2023),其评选的基本指标中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企业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可能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增加政府环保补助来提升企业 ESG 表现。

第一,文明城市创建政策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进而改善企业 ESG 表现。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标能够激发政府切实加强环境治理的意愿,促使地方政府官员增强当地环境规制力度(逯进等,2020),加强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污染,以达到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

满足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在短期内,政府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用于污染治理的成本,挤占企业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资源,产生“遵循成本效应”(逯进等,2020)。而从长期来看,根据“波特假说”,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可以驱使企业增加用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改善企业能源消费结构(刘金科、肖翊阳,2022),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弥补企业创新投入成本(杨菁菁、胡锦,2022),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企业长远发展。而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具有严格的复查机制,参选城市在获得“文明城市”荣誉称号后并非一劳永逸,仍会受到相关部门频繁的审查和动态的监督(王帅龙、孙培蕾,2023)。这使其成为一项长期的城市治理活动,能够解决短期“遵循成本效应”的约束,激发企业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一方面,企业通过在生产过程使用绿色生产技术,建造绿色生产线,以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表现,从而达到当地政府环境规制要求(王治等,2023)。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淘汰高污染的非绿色产品,为公众提供绿色、低污染的环保产品,为员工提供绿色的工作场所(王珮等,2021),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从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

第二,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能够增加当地企业获取的环保补助,为企业践行 ESG 理念、开展 ESG 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助力企业提升 ESG 绩效。《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列为八大环境之一,注重对城市环境卫生的考核和评价。“文明城市”考核标准会促使当地政府加强对企业的绿色资源支持力度,帮助企业解决在 ESG 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作为地方政府间“显性”的“锦标竞赛”,地方主政官员甚至将文明城市环境指标的考核与管理者的政绩相联系(徐换歌,2020),获得“文明城市”称号将有利于地方政府官员晋升(逯进等,2020),这可能会激发地方政府按照“逐顶竞争”模式参与城市环境治理(王帅龙、孙培蕾,2023)。同时,全国文明城市实施长效常态的创建机制,执行严格的复查机制,不达标者将被摘除“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袁方成、王悦,2023)。地方政府官员受政治激励的影响,会积极维持“文明城市”头衔,灵活运用多种方式为企业绿色行为提供补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刘建秋等,2023)。而政府环保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 ESG 实践提供资金保障。当地政府对企业提供财政补助能够弥补企业在节能转型、社会贡献过程的资金缺口(夏芸等,2023),为当地企业提供绿色资金来源,调动企业从事 ESG 活动的积极性。同时,获得环境治理补助的企业能够向外界释放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的绿色形象(陈晓珊等,2023),吸引更多绿色投资、ESG 投资流向企业,进一步缓解企业 ESG 实践过程中的资源约束。此外,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同样也具有“眼球效应”,企业往往需要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来转移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压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a: 文明城市创建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

H2b:文明城市创建通过增加政府环保补助进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 (一)数据说明

考虑到华证 ESG 评级机构从 2009 年开始披露 ESG 数据,本文以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数据筛选:①剔除上市状态为 ST、\*ST、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样本;②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③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样本,共得到 15744 个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对统计结果造成的偏差,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其中,企业层面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文明城市名单来自“中国文明网”,ESG 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的华证 ESG 评级,内部控制数据来自迪博数据库,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自 CNRDS 数据库,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 (二)变量定义

#####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 ESG 表现(ESG)。目前,主流 ESG 评级机构包括华证、彭博、商道融绿、润灵环球等。相较于其他评级机构,华证 ESG 借鉴了国外主流 ESG 的评价体系且将更多符合中国市场现实情况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从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 3 个一级指标、16 个二级主题指标、44 个三级议题指标的评价体系。此外,华证 ESG 数据涵盖了所有上市公司,数据量较多且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借鉴谢红军和吕雪(2022)、王禹等(2022)的做法,采用华证 ESG 评级数据来衡量企业 ESG 表现。华证 ESG 评级将公司 ESG 表现分为九档,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AAA、AA、A、BBB、BB、B、CCC、CC、C。本文将 ESG 评级从高到低赋值为 9 到 1,数值越大,企业 ESG 表现越好。此外,本文也分别将 E、S、G 各分项的评级赋值为 1—9,来表示企业环境、社会、治理方面的表现。

##### 2. 解释变量

文明城市创建(*Civilized*)。借鉴王雅莉等(2022)的研究,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删除位于第一批、第二批文明城市及北京等直辖市的企业,将位于第三批至第六批文明城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最终以 128 个城市的企业为实验组,其余企业为对照组。本文将获批时间为当年的 1—6 月份的城市,设定为当年拥有“文明城市”称号;获批时间为当年 7—12 月份,则设定为下一年开始拥有“文明城市”称号。由于第三批至第六批“文明城市”名单公布的时间分别为 2011 年 12 月、2015 年 2 月、2017 年 11 月与 2020 年 11 月,因此文章分别将 2012 年、2015 年、2018 年、2021 年设定为政策虚拟变量的时间。企业所在城市拥有“文明城市”称号的当年及以后的年份,*Civilized* 为 1,否则 *Civilized* 为 0。

### 3. 中介变量

(1)绿色技术创新( $\ln grn$ )。借鉴王莹和冯佳浩(2022)的研究,使用绿色专利申请总量加1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其中,绿色专利申请量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之和。

(2)政府环保补助( $Sub$ )。借鉴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的研究,使用企业当年获取的政府环保补助金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政府环保补助。

### 4.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王雅莉等,2022;翟胜宝等,2022;王禹等,2022),从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设定控制变量。在企业层面,选择销售收入增长率( $Growth$ )、股权集中度( $Share$ )、企业年龄( $Age$ )、资产负债率( $Lev$ )、两职合一( $Dual$ )和审计师声誉( $Big4$ )作为控制变量。在城市层面,选择工业程度( $Industry$ )、文化底蕴( $Culture$ )、财政科教偏好( $Fsd$ )、金融发展水平( $Finance$ )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ESG表现	$ESG$	对华证ESG评级由高到低赋值为9到1
解释变量	文明城市创建	$Civilized$	企业所在城市评选为文明城市的当年及以后年份 $Civilized$ 为1,否则为0
中介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环保补助	$\ln grn$ $Sub$	$\ln(\text{绿色专利申请总量}+1)$ 政府环保补助/企业总资产
控制变量	销售收入增长率 股权集中度 企业年龄 资产负债率 两职合一 审计师声誉 工业程度 文化底蕴 财政科教偏好 金融发展水平 行业 年份	$Growth$ $Share$ $Age$ $Lev$ $Dual$ $Big4$ $Industry$ $Culture$ $Fsd$ $Finance$ $Ind$ $Year$	(当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n(\text{当年年份}-\text{企业成立年份}+1)$ 总负债/总资产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是则为1,否则为0 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是则为1,否则为0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城市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亿册) 政府财政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行业虚拟变量 年份虚拟变量

### (三)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

$$ESG_{i,t} = \alpha_0 + \alpha_1 Civilized_{j,t} + \sum Controls_{i,j,t} + Ind +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 $j$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时间,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为回归系数, $ESG_{i,t}$ 为被解释变



量,代表企业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  $Civilized_{i,t}$  为文明城市创建的政策变量,  $Controls_{i,j,t}$  为控制变量,  $Ind$  为行业固定效应,  $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若  $\alpha_1$  显著为正,则说明文明城市创建会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此外,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多元定序变量,本文采用 Ologit 多元有序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采用经典三步法来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政府环保补助在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第一步为基准回归模型(1),第二步和第三步分别为以下模型(2)和(3):

$$M_{i,t} = \beta_0 + \beta_1 Civilized_{j,t} + \sum Controls_{i,j,t} + Ind +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2)$$

$$ESG_{i,t} = \gamma_0 + \gamma_1 Civilized_{j,t} + \gamma_2 M_{i,t} + \sum Controls_{i,j,t} + Ind +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M_{i,t}$  表示绿色技术创新 ( $\ln grn$ ) 和政府环保补助 ( $Sub$ ),  $\beta_0$  和  $\gamma_0$  为常数项,  $\beta_1$  和  $\gamma_1$  为回归系数,  $\gamma_2$  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其中,企业 ESG 表现 ( $ESG$ ) 的均值为 4.060,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8,表明不同企业的 ESG 表现存在较大差异。文明城市创建 ( $Civilized$ ) 的均值为 0.541,表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影响范围较广。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研究较为一致。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ESG</i>	15744	4.060	1.099	1.000	8.000
<i>Civilized</i>	15744	0.541	0.498	0.000	1.000
<i>Growth</i>	15744	0.165	0.449	-0.593	3.004
<i>Share</i>	15744	0.339	0.146	0.092	0.741
<i>Age</i>	15744	2.909	0.325	1.946	3.526
<i>Lev</i>	15744	0.441	0.212	0.060	0.974
<i>Dual</i>	15744	0.246	0.431	0.000	1.000
<i>Big4</i>	15744	0.033	0.177	0.000	1.000
<i>Industry</i>	15744	0.441	0.097	0.199	0.668
<i>Culture</i>	15744	0.761	0.845	0.037	3.835
<i>Fsd</i>	15744	0.210	0.041	0.115	0.308
<i>Finance</i>	15744	1.532	0.808	0.399	4.029

本文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 ESG 表现的相关系数为0.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可能为正向影响。

表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ESG	Civilized	Growth	Share	Age	Lev	Dual	Big4	Industry	Culture	Fsd	Finance
ESG	1											
Civilized	0.078***	1										
Growth	0.002	-0.027***	1									
Share	0.094***	-0.060***	0.025***	1								
Age	-0.062***	0.258***	-0.054***	-0.129***	1							
Lev	-0.157***	-0.085***	0.036***	0.023***	0.145***	1						
Dual	0.018**	0.082***	0.014*	-0.066***	-0.048***	-0.146***	1					
Big4	0.054***	0.011	-0.006	0.075***	0.032***	0.048***	-0.032***	1				
Industry	0.026***	-0.257***	0.016**	0.019**	-0.251***	0.012	-0.015*	0.005	1			
Culture	0.065***	0.449***	-0.016**	0.012	0.097***	-0.038***	0.062***	-0.001	-0.495***	1		
Fsd	0.109***	0.233***	-0.013*	-0.044***	-0.010	-0.108***	0.094***	-0.009	0.004	0.336***	1	
Finance	0.016*	0.377***	-0.021***	0.010	0.193***	0.009	0.011	0.005	-0.598***	0.460***	0.033***	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二)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参照 Beck 等(2010)、刘佳伟等(2024)的研究,根据四个批次文明城市的年份来计算创建前和创建后的相对时间,并生成年份虚拟变量与处理组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  $pre1—pre4$  为创建前四年,  $current$  为当年,  $post1—post3$  为后三年。同时,为消除模型中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将获评文明城市前一年( $pre1$ )作为基准组,并从回归模型中剔除  $pre1$ 。观察图1可知,在文明城市创建前,各年份对应的检验系数在0附近且不显著,说明文明城市创建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企业 ESG 表现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在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效应逐渐释放,表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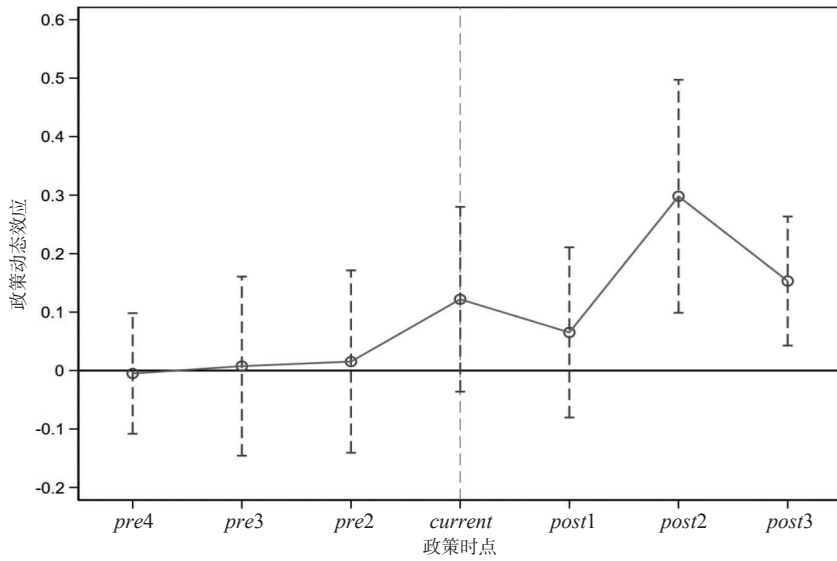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 (三)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给出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仅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Civilized* 的回归系数为 0.277,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列(2)将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加入回归模型中, *Civilized* 的系数为 0.144, 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文明城市创建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 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4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i>ESG</i>	<i>ESG</i>
<i>Civilized</i>	0.277*** (7.187)	0.144*** (3.384)
<i>Growth</i>		0.021 (0.533)
<i>Share</i>		1.079*** (10.067)
<i>Age</i>		-0.371*** (-7.103)
<i>Lev</i>		-1.437*** (-17.962)
<i>Dual</i>		-0.084** (-2.425)

续表 4

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ESG	ESG
<i>Big4</i>		0.720*** (8.036)
<i>Industry</i>		1.234*** (5.716)
<i>Culture</i>		0.066*** (2.747)
<i>Fsd</i>		3.264*** (8.332)
<i>Finance</i>		0.002 (0.078)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15744	15744
R <sup>2</sup>	0.015	0.032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z值;③标准误经过公司和年份层面双重聚类调整,下同。

#### (四)机制分析

##### 1. 绿色技术创新

表5中列(1)—(2)给出了采用式(2)和式(3)进行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结果。列(1)显示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文明城市创建促进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第(2)列显示将文明城市创建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纳入模型中后,两者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文明城市创建和企业ESG表现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文明城市创建会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假说H2a得到验证。

##### 2. 政府环保补助

表5中列(3)—(4)给出了采用式(2)和式(3)进行的政府环保补助的机制检验结果。列(3)显示文明城市建设对政府环保补助的影响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文明城市创建促进企业获取环保补助。列(4)显示将文明城市创建和政府环保补助同时纳入模型中后,两者对企业ESG表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环保补助在文明城市创建推动企业提升ESG表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明城市创建能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财政支持,进而激励企业提升企业ESG表现。假说H2b得到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i>ln grn</i>	<i>ESG</i>	<i>Sub</i>	<i>ESG</i>
<i>Civilized</i>	0.056*** (2.677)	0.129*** (3.026)	0.005** (2.084)	0.142*** (3.339)
<i>ln grn</i>		0.341*** (19.531)		
<i>Sub</i>				0.330** (2.3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744	15744	15744	15744
R <sup>2</sup>	0.175	0.041	0.098	0.032

### (五) 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不同机构的评级体系之间存在差异,可能会对统计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借鉴温桂荣等(2023)的研究,使用彭博ESG评分的自然对数(*ESG\_new1*)替换华证ESG数据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ESG\_new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再次证实了假说H1。此外,本文参照谢红军和吕雪(2022)的研究,使用两种方法替换企业ESG表现的测度方式。第一,将ESG评级为A—AAA的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第二,将ESG评级为A—AAA的赋值为3,B—BBB的赋值为2,C—CCC的赋值为1。分别使用两种赋值方式的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6列(2)—(3)所示,进一步表明了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对企业ESG表现存在增益效果,仍然符合假说H1。

表 6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i>ESG_new1</i>	<i>ESG_new2</i>	<i>ESG_new3</i>
<i>Civilized</i>	0.065** (2.118)	0.004** (2.475)	0.116** (2.25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6170	15744	15744
R <sup>2</sup>	0.877	0.073	0.059

## 2.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为避免类似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来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提升的净效应。2016—2017 年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全国 31 个省份进行第一轮环保督察,可能会对当地企业 ESG 表现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中央环保督察的虚拟变量 (*ZD*) 纳入回归模型中,以排除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在控制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后, *Civilized* 的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文明城市创建确实能够显著促进企业 ESG 表现水平的提升。

表 7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变量	(1)
	<i>ESG</i>
<i>Civilized</i>	0.144*** (3.386)
<i>ZD</i>	-0.035 (-0.332)
控制变量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15744
R <sup>2</sup>	0.032

## 3. 联合固定效应

本文在公式(1)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 列(1)所示。由列(1)可知,在控制了时间和行业的联合固定效应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 4. 考虑文明城市评选复审机制的影响

考虑到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存在着严格的复审机制,通过复审的城市将会保留文明城市的头衔,而未通过复查的城市将会被移出文明城市的名单。因此,本文采用三种方式将文明城市的复审机制纳入到回归结果,分别对应 *Civilized\_new1*, *Civilized\_new2*, *Civilized\_new3*。第一,参考刘佳伟等(2024)的研究,若城市从文明城市名单中剔除的,则从剔除的年份开始设置为 0,直至重新被评为文明城市。第二,若城市 *j* 在 *t* 年被评选为文明城市,则从 *t* 年至下一轮复审名单公布前均赋值为 1;若全国文明城市 *j* 通过了第一次复审,则从第一次复审名单公布年份至下一次复审通过名单公布前赋值为 2;若全国文明城市通过第二次复审,则赋值为 3;若通过第三次复审,则赋值为 4。第三,用城市拥有“文明城市”称号的时长来衡量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8 列(2)—(4)所示,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能够长效推进企业 ESG 实践。

表 8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ESG	ESG	ESG	ESG
<i>Civilized</i>	0.061*** (3.537)			
<i>Civilized_new1</i>		0.071*** (4.155)		
<i>Civilized_new2</i>			0.065*** (3.837)	
<i>Civilized_new3</i>				0.022*** (3.0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和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样本量	15744	15744	15744	15744
R <sup>2</sup>	0.039	0.032	0.032	0.031

## 五、进一步分析

在前文中,本文验证了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然而,在不同情境下,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从产权性质、内部控制质量和行业竞争程度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此外,ESG 由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公司治理(G)三大部分组成,企业受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影响所提升的 ESG 每个维度的表现也可能存在区别。因此,本文区分 E、S、G 分项进行回归。

### (一) 异质性分析

首先,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因战略定位、利益诉求等存在差异,在 ESG 表现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也有所不同(张长江等,2021)。由于国有企业作为“领头羊”,对国家宏观政策更加敏感,需要更多地承担政策所带来的环境社会责任,会最先受到文明城市创建的冲击,并且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有力执行者(石大千等,2019),努力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响应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参照王禹等(2022)的研究,将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若企业为国有企业,产权性质(*Soe*)设置为 1,否则为 0。本文将产权性质(*Soe*)以及产权性质和文明城市创建的交互项( $Soe \times Civilized$ )纳入式(1)中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9 列(1)所示。由结果可知,产权性质与文明城市创建的交乘项( $Soe \times Civilized$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

其次,健全的内控制度能够监督和约束企业管理层,规避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助力提升企业内部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战略规划往往具有前瞻性,管理层能够从长期角度思考问题,更加重视企业的长远发展(于连超

等,2019)。参照翟胜宝等(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本文将内部控制质量( $Ic$ )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和文明城市创建的交通乘项( $Ic \times Civilized$ )纳入式(1)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列(2)所示。由列(2)可知,内部控制质量与文明城市创建的交通乘项( $Ic \times Civilized$ )的回归系数为0.001,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相较于内部控制较差的企业,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控制较好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最后,当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激烈时,市场上的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的客户黏性较低,企业难以通过提高售价将额外的环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企业唯有改善内部的生产经营,积极从事ESG实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企业为争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限资源,有动力采取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行为改善自身行为(魏延鹏等,2023)。参照吴梦云等(2023)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并根据赫芬达尔指数的年度中位数区分行业竞争程度,若赫芬达尔指数大于年度中位数,表明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相对较低, $HHI$ 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将行业竞争程度( $HHI$ )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文明城市创建的交通乘项( $HHI \times Civilized$ )纳入式(1)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9列(3)所示。由列(3)可知,行业竞争程度和文明城市创建的交通乘项( $HHI \times Civilized$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行业竞争越激烈,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提升作用越显著。

表9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i>ESG</i>	<i>ESG</i>	<i>ESG</i>
<i>Civilized</i>	0.140*** (3.294)	0.104** (2.413)	0.138*** (3.260)
<i>Soe</i> × <i>Civilized</i>	0.104* (1.711)		
<i>Soe</i>	0.330*** (9.274)		
<i>Ic</i> × <i>Civilized</i>		0.001*** (4.468)	
<i>Ic</i>		0.004*** (32.387)	
<i>HHI</i> × <i>Civilized</i>			-0.878*** (-2.616)
<i>HHI</i>			-0.075** (-2.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744	15744	15744
R <sup>2</sup>	0.034	0.061	0.032



## (二)ESG 分项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在提升企业 ESG 表现的过程中对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方面表现的作用是否一致,本文将模型(1)中的 ESG 表现替换为环境(E)、社会(S)、治理(G)各分项的绩效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10 列(1)—(3)所示。列(1)—(3)显示文明城市创建在企业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表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显著性存在差异。其中,对环境保护(E)表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表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各分项的绩效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尤其是对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可能的原因是,企业的环境保护表现本来就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激励和监管,因而相较于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表现,其对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敏感性相对较弱。因此,在文明城市创建政策的号召下,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表现提升的空间和潜力更大。

表 10 ESG 分项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i>E</i>	<i>S</i>	<i>G</i>
<i>Civilized</i>	0.074* (1.751)	0.150*** (3.651)	0.185*** (4.3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744	15744	15744
R <sup>2</sup>	0.034	0.047	0.083

##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文明城市评比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探究文明城市创建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必要的。本文以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索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1)文明城市创建能够显著提升企业 ESG 表现;(2)机制检验表明,文明城市创建通过促使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增加企业获取的政府环保补助来提升企业 ESG 表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健全和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中更加显著;(4)将企业 ESG 表现细分三个维度研究的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各分项的表现均发挥显著提升作用,且其对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

本文结论对于提升企业 ESG 表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对此,提出如

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继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充分发挥文明城市创建对企业ESG实践的激励引导作用,努力实现城市文明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文明城市创建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政府环保补助推动当地企业ESG实践,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既要继续推进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严格实施文明城市的复审机制,倒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长效提升企业ESG绩效。同时,还要确保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落实到微观企业,加大对于当地企业资金支持力度,弥补企业从事ESG活动引发的额外成本,激励企业加强ESG管理,助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府应当根据企业和行业特征的不同分类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以高效提升ESG表现。首先,应充分考虑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对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的积极性和敏感性差异。既要继续强化国有企业在ESG表现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要调动非国有企业提升ESG表现的热情和动力,逐步引导非国有企业履行ESG责任。其次,应差异化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引导企业结合文明城市评选要求建立契合时代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内外结合的公司治理体系,以规范企业ESG行为。最后,应当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行业内良性竞争以提升企业从事ESG实践的动力,保障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积极作用的正常发挥。

第三,企业要积极响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政策的号召,及时调整企业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本文研究发现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能够增加企业环保补助,引导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优化企业ESG表现。企业应当意识到伴随着文明城市创建,政府对于企业文明程度也会愈来愈重视。企业应主动抓住政策机遇,深入了解当地政府对企业ESG表现的要求及相关优惠政策,实施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方向一致的目标战略,依托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财政支持,大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在实现企业ESG战略转型的同时促进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 参考文献:

- [1] 蔡海静,王雪青,谢乔昕.环境规制视阈下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财经论丛,2023(05):102-112.
- [2] 陈家和,吴一平,李鹏飞.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就业选址决策[J].财经研究,2022,48(05):140-154.
- [3] 陈琪,李梦函.垂直型环境监管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06):45-62.
- [4] 陈晓珊,陈思敏,刘洪铎.“双碳”目标下政府环境治理补助会提升公司ESG表现吗[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5):132-144.
- [5] 李青原,肖泽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9):192-208.
- [6] 刘佳伟,邓博夫,罗正英,等.“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与企业跨区域投资布局——基于2008—2018年上市公司新增子公司地理分布的实证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46(02):35-52.
- [7] 刘建秋,徐雨露.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J].技术经济,2023,42(05):

45-55.

[8] 刘建秋,周承芳,徐雨露. 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3, 20(06): 41-50.

[9] 刘金科,肖翊阳. 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 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J]. 经济研究, 2022, 57(01): 72-88.

[10] 柳学信,李胡扬,孔晓旭. 党组织治理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J]. 财经论丛, 2022(01): 100-112.

[11] 逯进,赵亚楠,苏妍. “文明城市”评选与环境污染治理: 一项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0, 46(04): 109-124.

[12] 牛耕,何雨可,赵国昌. 城市品牌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证据[J]. 人口研究, 2022, 46(06): 117-130.

[13] 湛仁俊,杨杰,戴成燕,等. 荣誉的力量: 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J]. 产业经济研究, 2021(02): 71-84.

[14] 石大千,胡可,陈佳. 城市文明是否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与交易成本视角[J]. 产业经济研究, 2019(06): 27-38.

[15] 王浩宇. 资本市场开放会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吗?——基于企业 ESG 表现的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07): 116-129.

[16] 王珮,杨淑程,黄珊.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J]. 税务研究, 2021(11): 50-56.

[17] 王帅龙,孙培蕾. 文明城市评选对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3, 39(19): 82-86.

[18] 王雅莉,侯林岐,朱金鹤. 文明城市创建如何“催生”企业“道德血液”?——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22, 48(06): 64-78.

[19] 王营,冯佳浩.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J]. 金融研究, 2022(06): 171-188.

[20] 王禹,王浩宇,薛爽.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 ESG 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研究, 2022, 48(09): 47-62.

[21] 王治,彭百川,郭晶晶,等. 低碳转型能否提升企业环境-社会-治理表现? ——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3, 44(01): 139-145.

[22] 魏延鹏,毛志宏,王浩宇.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3, 20(07): 984-993.

[23] 温桂荣,周温馨,黄家伟. 企业 ESG 表现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9(12): 96-110.

[24]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 731-745.

[25] 吴梦云,朱俞青,朱佳立,等. 二代涉入影响家族企业 ESG 表现吗[J]. 会计研究, 2023(10): 115-128.

[26] 吴敏,黄玖立. 政府间的竞赛治理是否有效: 文明城市评比与城市卫生[J]. 世界经济, 2022, 45(03): 212-232.

[27] 夏芸,张茂,林子昂. 政府补助能否促进企业的 ESG 表现?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J]. 管理现代化, 2023, 43(01): 54-63.

[28] 谢红军,吕雪. 负责任的投资: ESG 与中国 OFDI[J]. 经济研究, 2022, 57(03): 83-99.

[29] 徐换歌,陈波. 城市声誉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自然实验[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22(04): 66-76.

[30] 徐换歌. 评比表彰何以促进污染治理? ——来自文明城市评比的经验证据[J]. 公共行政评论, 2020, 13(06): 151-169+213.

[31] 杨菁菁,胡锦涛. ESG 表现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J]. 环境经济研究, 2022, 7(02): 66-88.

- [32] 姚鹏,张泽邦,孙久文,等.城市品牌促进了城市发展吗?——基于“全国文明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财经研究,2021,47(01):32-46.
- [33] 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02):79-90.
- [34] 袁方成,王悦.以赛促治:“达标锦标赛”如何驱动治理有效[J].公共行政评论,2023,16(06):46-67+197.
- [35] 詹新宇,王一欢.荣誉的力量:共建共享全国文明城市增强企业纳税遵从了吗?[J].财贸经济,2022,43(10):40-56.
- [36] 张长江,张玥,陈雨晴.ESG表现、投资者信心与上市公司绩效[J].环境经济研究,2021,6(04):22-39.
- [37] 翟胜宝,程妍婷,许浩然,等.媒体关注与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J].会计研究,2022(08):59-71.
- [38] 朱金鹤,王雅莉,侯林岐.文明城市评比何以促进劳动力流入?——来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21(03):43-56.
- [39] Barko, T., M. Cremers, L. Renneboog. Shareholder Engagement on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2, 180(2): 777-812.
- [40] Beck, T., R. Levine, A. Levkov.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5): 1637-1667.
- [41] Cucari, N., S. Esposito De Falco, B. Orlando. Diversity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5(3): 250-266.
- [42] DasGupta, R. Financial Performance Shortfall, ESG Controversies and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irms around the World[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 46: 102487.
- [43] Garcia, A. S., W. Mendes-Da-Silva, R. J. Orsato. Sensitive Industries Produce Better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 150: 135-147.
- [44] Li, B., Y. Han, C. Wang. Did Civilized City Policy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Prefecture-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Energy Policy*, 2022, 167: 113081.
- [45] Li, G., H. Wen. The Low-Carbon Effect of Pursuing the Honor of Civilization? A Quasi-Experiment in Chinese Cities[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3, 78: 343-357.
- [46] Li, L., J. Chen, H. Gao. The Certifica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ial Firms' Access to Bank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2: 241-259.
- [47] Ren, X., G. Zeng, Y. Zhao. Digital Finance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3, 79: 102019.
- [48] Zhang, C., Q. Liu, G. G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ward[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1, 39: 101624.
- [49] Zhang, M., Y. Hong. Effects of Civilized Cities Commendation o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2023, 55(35): 4060-4077.

# The Impact of Civilized Cities Creation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Zhang Rao, Xu Rong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new mode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preliminary study find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can improve the ESG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by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asing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sidie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ffect of civilized city creation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is more prominent among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with sound internal control, and enterprises with intense competition in industries.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ESG index show that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E), social (S), and governance (G), especially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S) and governance (G).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policy of creating civilized cities, improve the policy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and provide resource support for corporate ESG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should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to the creation of civilized cities and seize the policy opportunities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ESG.

**Keywords:** Civilized Cities;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Subsidies

**JEL Classification:** Q5

(责任编辑:卢 玲)